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张金鹏 主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主 编 张金鹏
副主编 郭昭昭 赵 勇
向 明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D010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张金鹏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 - 7 - 5650 - 1722 - 3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1796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张金鹏 主编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张	13.25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217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1722 - 3

定价: 35.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总 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	(001)
第一节 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02)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011)
第三节 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与方法	(020)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028)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概述	(028)
第二节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039)
第三节 中国的经济发展	(044)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对外开放	(050)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	(060)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概述	(060)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064)
第三节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075)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081)
第一节 文化及其基本特征	(08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及人文传统	(088)
第三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然与方向	(095)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	(104)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	(105)
第二节 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110)
第三节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115)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建设	(130)
第一节 生态文明	(131)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	(140)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与依靠力量	(163)
第一节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	(163)
第二节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新工程	(177)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	(186)
第一节 当今世界的特征	(186)
第二节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190)
第三节 落实外交工作布局, 实现国家统一	(197)
结 语	(203)
后 记	(205)

总 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来龙去脉

内容提要：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性飞跃，即：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这次飞跃使得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一门反对资本主义、寻求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这次飞跃的意义在于使社会主义以现实样态出现在人类历史之中，从而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从一种模式到多样性探索的飞跃，这次飞跃打破了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开始了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使得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新的活力和广阔的前途。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和最终归宿。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当今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态，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推进，又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它既是中国化了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体现与发展。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以及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对世界局势的把握；不仅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和新成果，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新阶段。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首先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入手，从历史发

展的角度分析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共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同时，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从中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点，只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放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宽广背景之中，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才能真正从历史深处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科学性、实践上的可行性以及历史维度上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因此，在总论部分，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展开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与研究，从而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历史的、全面的、整体性视角。

第一节 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历史问题的回答，是在剖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和矛盾解决方法的理论与思想，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体系。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人们不仅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日益提高。

（一）从空想到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由来已久，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他的社会理想，而孔子则提出了他的“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这说明了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思想源远流长，但不能因此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于这些时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社会主义思想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离开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去谈论社会主义这个“逻辑”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有害的。尽管古代先哲的社会理想对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启示作用，但在理解社会主义

思想时，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从16世纪延续到17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和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等^①。其中托马斯·莫尔的著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其中“乌托邦（Utopia）”一词已经成为某种不切实际或无法实现的社会理想的代名词。由于这个时期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处于萌芽状态，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无论是莫尔还是康帕内拉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带有严重的空想性，其中猜想的成分远远大于理论论证的成分，也没有摆脱小农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影响。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英法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得到确立，无产阶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历史现实使得此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新的理论内容和发展形态。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杰拉德·温斯坦莱、法国的摩莱里、马布利、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等。相对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以自然法和理性论为基础批判资本主义并用法的方式规定和描述社会主义，无论是理论性还是论证性都明显高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但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特征。

19世纪早期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大机器工厂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开始确立其政治上的统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展开和尖锐化，同时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越来越具有其阶级独立性，

^①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出身于英国法官家庭，从法学院毕业后曾任律师，当过议员，因反对英王特权而受到迫害。1516年他出版的《乌托邦》一书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他也因此被看作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太阳城》及其续篇《论最好的国家》。《乌托邦》和《太阳城》都是以游记的方式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描述的。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是德国的一位职业革命家，主要是在实际斗争中通过发表演讲与小册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理想是要建立早期基督徒所向往的“千年王国”。

即无产阶级开始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社会“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①”^②。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批判资本主义，试图以此证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并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设计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度远远超出了自摩尔以来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在批判资本主义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们既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没有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因此既不能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也不能找到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力量，最终都陷入了空想。随着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也就具备了其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通过继承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融合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文化成就，总结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矛盾充分暴露和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尤为迫切。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不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之后是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否具有其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无产阶级是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的现实力量？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们活动的主观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从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有

^①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代表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制度》等，他的理想社会是建立人人劳动的实业制度。弗朗索瓦·马利·夏尔·傅立叶（1772—1837），出生于法国呢绒富商之家，一生著述很多，内容庞杂，他的理想社会是和谐制度，其基本单位名为“法郎吉”。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杰出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和实践家，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不同，欧文非常注重共产主义的实践，曾创立名为“和谐新村”的共产主义公社。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1页。

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它在经济上必然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在政治上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只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自己并最终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发现，也不是现实应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就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革命化。

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与暂时性还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从而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力量。通过对英法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发展致富的秘密，泄露了资本主义的“天机”，即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在于无偿占有了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换言之，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真正源泉，是资本自我增值的秘密所在。剩余价值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解蔽，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现象学式的批判，并找到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革命力量即现代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将科学社会主义置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科学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①。

科学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置于了科学之上，从而消除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和空想的成分，不仅把社会主义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使得社会主义运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而且把工人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世界工人运动才真正实现了从自发到自为的转变，工人运动也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同时，还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正是由于有了科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被打上了社会主义的印记，而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则整个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出现了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并存与竞争的局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二）从理论到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伊始就力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相统一，他们不仅改组了正义者同盟，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且还在其后建立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等世界无产阶级政治组织，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机构。由于当时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方面仍然是理论形态；虽然其间出现过巴黎公社的短暂实验，但社会主义作为现实还没有出现。直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才实现了它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此科学社会主义就在理论与实践相互交叉和相互促进中发展起来。

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理论层面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理论，即帝国主义论和一国首先胜利论，在实践层面主要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敏锐地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一新阶段的矛盾，根据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找到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沙皇俄国，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找到了契机，并适时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拥有了新的样态。

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最主要的是他以实践为基础展开的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这些探索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内战时期，列宁曾经设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现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但随后列宁根据当时俄国的现实和国情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想法，施行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符合当时俄国的国情的有效措施，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第一次有益发展。列宁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卓越的理论家，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杰出的实践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构建了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即影响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虽然在确立初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但由于其一方面教条地理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错误地认识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再加上这一制度高度集中的性质，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僵化、政治生活的反民主化、文化生活的贫乏化。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具有其历

史必然性，是由这一模式本身所包含的矛盾与缺陷决定的。但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斯大林模式不仅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有效的模式，更不能等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不仅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反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飞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这一飞跃使得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了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的发展阶段，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其次，这一飞跃使得社会主义第一次以现实的样态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再次，这一飞跃初步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航标。

（三）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新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20世纪5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关系体制方面的严重弊病，并开始尝试通过改革来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次改革，一方面因为苏联的阻挠和干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架，都以夭折而告终，并造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损失。

这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要想真正走出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进行重大改革，而不能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小的修修补补。换言之，新的改革必须是整个体制本身的变革，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构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这种改革由于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第二次革命，而不单单是一种改良。这次革命与第一次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是自下而上的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是整个社会制度本身的变革；前者则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自上而下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发展。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及苏联控制力的减弱，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第二轮改革开放，由此正式进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开始对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并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全方位

的改革与开放。在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指导思想、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和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失误，因而各国共产党丧失了对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权，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出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后果。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苏东教训”，其改革失败所产生的历史遗产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优先，要始终做到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尤其要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改进党的执政方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这一次飞跃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科学地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到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科学设计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和基本道路，正确处理了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得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和重大成就。由于我国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如何在落后的国家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因而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但没有出现苏联和东欧那样的大动乱和基本制度上的彻底变更，而且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政治生活日益民主，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社会主义发展的空间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成为引起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中国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当今的世界仍然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施行的制度，而且资本主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改良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局势更为复杂，各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同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道路仍然处于探索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还远没有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革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甚至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说第三次飞跃已经完成，而只能是处于实现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完成之后会是怎样一种样态，都还需要社会主义的历史本身做出回答。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般而言包括六个方面，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自觉的、长期的奋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还只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步，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需要经历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历史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这六个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和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的自觉选择。这一选择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遵循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资本主义发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之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难的革命并掌握了政权，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实现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基础，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开展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正是在坚持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取得的，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正确地认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历史阶段，才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篇章。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实现和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上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首要的和本质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并促成共产主义实现的现实物质基础的实现，最终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实现共产主义同样要以生产力充分发展为物质基础，“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发展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并促成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概括是完全一致的，即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准确把握，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化。

第三，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一切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制度性基础之一。科学社会主义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要求，因为只有施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一方面消除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消除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剥削与压迫。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共产主义的所有制基础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恩格斯则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发展，在基本制度层面上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与核心。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其中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历史阶段，是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被废除，但还存在着“旧社会的残余”，即所谓资产阶级的法权，因此还需要无产阶级经过长时期的专政来巩固社会主义成果。同时，根据列宁的说法，这个时期的国家将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从国家向非国家的过渡，因此，社会主义的民主将实行最大范围的民主，即真正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它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一民主所采取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而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此，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主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化，是无产阶级专政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同样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其曲折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提出经过十到十五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鉴于当时广大人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4页。

群众建设热情的高涨和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党中央于1952年决定提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所谓的“三大改造”。三大改造从1953年开始到1956年上半年基本完成，同样比最初预计的十到十五年大大提前。从三大改造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具体表现为：第一，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基础上，我国依靠国家的力量，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我国在农村合作化改造中，采取典型示范、自愿加入的方式；在城市手工业和工商业改造中，采取和平赎买和公私合营等方式。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采取的是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方式。第二，在具体做法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采取的是“一化三改”和“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第三，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步进行，相互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同时并举、同步进行的，通过“一化三改”，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建设蕴含在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社会主义革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经过差不多三年的时间，1956年上半年，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各项任务，这标志着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①？为此，我们在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一探索应该说取得了良好的开端，集中表现就是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代表大会以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而载入史册。以党的八大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这些理论、方针、政策构成了“八大路线”。八大路线，综合起来看，可以概括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